

克伦斯基等 目睹的俄国 一九一七年革命

德·阿宁编



克伦斯基等目睹的 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

〔俄〕德·阿宁 编

丁祖永 胡汉英 沈法良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钱月华

Д.АНИН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ГЛАЗАМИ
Е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Edizioni Avroga Roma
1971

根据罗马阿美乐尔出版社1971年俄文版译出

克伦斯基等目睹的
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

Kelunsiji Deng Mudu De
Eguo Yijiuyiqi Nian Geming

〔俄〕德·阿宁 编

丁祖永 胡汉英 沈法良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75印张 283,0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600

书号 11002·641 定价 1.95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本书一九七一年由罗马阿芙乐尔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书中收入了克伦斯基、切尔诺夫、策烈铁里、邓尼金、米留可夫、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等十五人的二十一篇回忆和文章。按时间顺序分三部分，每一部分先是大事记，然后是回忆和文章，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发生起，逐月甚至逐日写起，直到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立宪会议被驱散为止。第一部分谈一九一七年二、三月的情况，主要涉及二月革命的发生与沙皇的退位，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成立。第二部分谈一九一七年四至八月的情况，主要涉及临时政府继续帝国主义战争并企图在前线冒险发动进攻以转移国内视线，列宁的四月提纲和布尔什维克的七月武装示威，科尔尼洛夫的叛乱。第三部分谈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的情况，主要涉及临时政府的垮台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立宪会议的被驱散。

书中所收文章的作者除托洛茨基外，其他人在一九一七年都是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后来也进行反布尔什维克党和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等活动，收在本书中的他的那篇文章就意在标榜自己和贬低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对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立场需加批判。这些作者都是当时的首脑人物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都是所描述事件的参与者(大多是从反对革命的立场上参与的)或目睹者,所以从史料的角度看,尚有一定参考价值。

原书编者德·阿宁,出生于俄国,流亡国外,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曾在俄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期刊上发表文章,是所谓的苏联问题和俄国革命史撰稿人,并是一九六一年纽约出版的《俄国和苏联百科全书》编辑之一。他自称同本书所收文章的作者大部分都熟识并有交往。他为本书写了序言、引言(《革命和革命历史著作》)和后记(《关于失败的原因》),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同克伦斯基等人一样,是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序言、引言和后记对克伦斯基和临时政府的情况,对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等党派的起落和主要成员,对收入本书文章的作者和有关背景情况,都提供了一些有一定价值的史料,因而一并译出,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为了帮助阅读,我们请世界历史研究所李显荣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附在书后,这篇文章对这些作者和原书编者及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作了一些介绍、分析和批判。

书中有些文章写得晦涩,难免译错,尚希读者指正。普列汉诺夫的《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和《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两篇是王荫庭、杨永、杨泰同志翻译的。

一九八三年一月

序 言

本书不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俄国革命史。它的宗旨很简单：介绍那些被事件推上极重要岗位的人，是如何认识、感受和评价这场革命及其各个阶段的。这里谈及的不是这场革命的普通参加者或目睹者，而特别是它的领导人物。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对各种事实、见解、证据和其他文献的对比与选择，试图查明难以断定的事态的“客观”过程。而本书与历史学家不同，它只限于转述这样一些人的主观见证和叙述，有时则加以对照，这些人不但观察和研究了这段历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创造了这段历史。

不过，这样的书也同任何其他历史书一样，要求进行选择，而选择总带有随意性。我尽量把从君主派直到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一九一七年各派领导人著作中的某些章节编入本书。我在书中摈弃了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作者，因为他们的观点和对革命事件的叙述，已为人们所熟知。虽然如此，我还是试图在引言的第一部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历史著作的各个主要阶段加以概括的分析。在引言中，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作者描写这场革命的著作。当然，既以这场革命为主题，我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侨民作者的著作，因为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当过革命的领导人，对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过影响。

众所周知，虽然革命是突然爆发的，没有哪一个俄国政党直接加以领导，但是，这场革命不久就处于一些政党的影响和领导之下。因此，引言中有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了革命时期一些有影响的主要政党的情况，以及它们对当时已提上议事日程的种种问题所采取的政治立场。西方的历史学家，应当说，还有苏联的历史学家，无论在引言中，还是在选入本书的正文中，都不会找到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本书的编者希望，这里汇集的材料和正文前的“定向”文章，将能帮助“中间”读者认识清楚那一般认为曾经“震撼”和轰动过世界的事件。

我尽可能把这样一些作者的著作收入本书，因为我认为，从他们参加革命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些最有代表性和最为典型的作者。未必需要强调指出，这些作者——政治活动家——对事件的描述，是与他们十分主观的解释交织在一起的。这样的“历史学家”，如邓尼金将军、切尔诺夫、托洛茨基、克伦斯基、策烈铁里，甚至还有职业历史学家米留可夫，当然是从某种角度来叙述事件，偏重那些他们认为值得注意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家早就遵循的原则：不但应该研究历史事件，而且也应当研究历史学家本人，即研究他的信仰、个人经验、过去、嗜好、偏见和信条。不了解这一切，有时便不会懂得，“客观的”历史学家为何宁肯采用这样一些事实，而不去注意或者贬低另外一些事实。尤其是，当历史学家或回忆录作者是所发生的事件的积极参加者（他在描写这一事件时必然要回顾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的时候，就更要记住这一原则。

除有一篇文章是例外（关于维尔霍夫斯基将军的那篇文

章),所有的作者——事件的参加者,在本书中都是用自己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说法的。我力求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编排,分别把那些在事件中起过首要作用的作者的文章收进本书。例如,《四月的日子》就收入米留可夫的主张;《科尔尼洛夫的发难》则收入克伦斯基和邓尼金的主张;《十月革命》收入托洛茨基的见解。这种方法取得多大的成功,只有读者才能作出判断。

在本书中,有些文章和章节是从二月革命时期起过领导作用的那些作者所写的书中选出来的,不过通常作了删节(但决不改动)。在各种场合,都保留了这些作者的风格甚至部分用语(爵位、军衔、国家与政治组织和机关的名称等)。为了客观起见,本书第二部分的《大事记》采用了各种消息来源,但主要是H·阿夫杰耶夫等人编写的《革命大事记》。

读过本书全部或部分手稿的有下列人员:H·E·安德烈耶夫,A·O·帕里,IO·A·皮西缅内,M·JI·斯洛尼姆,K·JI·菲茨莱翁,B·C·弗兰克和JI·M·沙皮罗。谨借此机会对他们的指教与建议深表感谢。但是,不言而喻,对本书的一切事实性或其他性质的错误,均由我本人负责。

德·阿宁

目 录

序 言	德·阿宁(1)
革命和革命历史著作(引言).....	德·阿宁(1)
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	(101)
第一部分(二月至三月)	
革命的开始、胜利和稳定.....	(103)
大事记	(103)
二月革命的日子.....	弗·米·晋季诺夫(113)
尼古拉二世和革命头几天的	
大本营.....	A·C·卢柯姆斯基(126)
沙皇退位及其大臣的被捕	瓦·维·叔尔根(135)
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弗·别·斯坦凯维奇(147)
临时政府及其部长们	弗·德·纳波柯夫(156)
各社会主义政党	维·米·切尔诺夫(168)
第二部分(四月至八月)	
(政权和革命的双重危机)	(183)
大事记	(183)
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	
有时梦话值得注意.....	格·瓦·普列汉诺夫(186)

对外政策分歧导致了四月危机……	伊·格·策烈铁里(198)
四月危机的后果……	巴·尼·米留可夫(210)
前线的六月进攻……	弗·别·斯坦凯维奇(221)
布尔什维克六月十日的阴谋……	伊·格·策烈铁里(232)
七月的日子……	尼·尼·苏汉诺夫(247)
七月以后的日子和科尔尼洛夫将军 的发难……	亚·费·克伦斯基(261)
政变不可避免……	安·伊·邓尼金(281)

第三部分(九月至十二月)

(十月革命的准备和发动)……	(291)
大事记……	(292)
亚·伊·维尔霍夫斯基将军的建议……	(295)
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的最后尝试 ……	费·伊·唐恩(301)
十月二十五日……	尼·尼·苏汉诺夫(321)
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	格·瓦·普列汉诺夫(334)
加契纳……	亚·费·克伦斯基(340)
十月革命是谁发动和怎样完成的? ……	列·达·托洛茨基(358)
立宪会议的召开和驱散……	马·本·维什尼亚克(376)

后记(关于失败的原因)…… 德·阿宁(391)

评〈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 李显荣(414)

革命和革命历史著作(引言)

德·阿宁

一

可以认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最近半个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已经写出了许许多多的书籍、文章、回忆录和各种学术著作。描写革命或与革命直接有关的题材的著作，为数多达几万本。仅有关革命的书籍目录便有好几多卷，其编纂工作早已不是某一人所能胜任的了。

当然，就数量而言，论述革命的著作的主要出版者是苏联，最近几年尤其如此。苏联作者为庆祝革命纪念日而发表的作品数字，会使人对这些年来就这一主题出版的书籍与文献的数量，产生某种概念。例如，苏联历史学家Г·Н·戈利科夫写道，仅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就大约发表了七千部论述革命的各类著作。同一作者补充说，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便出版了一百二十八部文献汇编，这些汇编“首次向学术界提供了二万二千件文献资料”。

但是，如作进一步研究便会发现，苏联描述革命的许多著

作都互相“抄袭”，用苏联作者的术语来说，这些著作存在着“平行重复”和“主题狭窄”等现象。为了筹备出版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新的“学术”著作，苏联科学院历史学分部学术委员会举行会议，提出要克服苏联革命历史学家所固有的上述缺点，并得出一个明智的结论：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学术委员会主席伊·伊·明茨院士提醒说，虽然出版了几千部书，但苏联历史学家仍没有创作出“关于革命的总结性作品”。他有充分根据地写道，“可以具体地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出版二千部书，而是出版二百部，但质量较好，内容也不重复，那将节省多少纸张、多少资金和多少精力啊”。

要评述苏联关于革命的历史著作，除其数量浩如烟海外，更复杂处在于，苏联作者，有时西方作者也认为，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发生的不是两场革命，而只是一场革命。这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是，推翻君主政体和试图在俄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二月革命，只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开端、前奏、萌芽和序幕。由于存在这种观点，想严格按照二月革命范围的作者，便很难忽视数量众多的表面上谈十月革命、而实际上也研究二月革命的著作。另一方面，这一“序幕”，除了被故意歪曲之外，通常在“伟大十月革命史”这个总的模式中占的地位也非常渺小。近几年来已颇具规模的关于列宁和关于苏共历史的题目，也是同二月革命紧密相连的，在这些题目中，二月时期的事件当然占有一定的位置。例如，除了几万本专谈列宁的“学术”著作和普及著作之外，苏联历史学家正在编纂一套将“逐日反映、甚至尽可能逐时反映”这位受贺者生平活动中的重大事件的多卷传记，这条消息将使人对为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已经出

版或仍准备出版的书籍之多有所了解。

二月革命在苏联的历史著作中“很不走运”

这本关于俄国革命的新书的编者，面对着那怕是大体地进行分类、浏览一下这些出版物的任务，也被它们那无边无际的数量弄得不知所措。这一企图乍看起来难以实现，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没有希望。事实上，尽管统计数字大得惊人，但真正有价值的书籍与历史著作，特别是关于本书感兴趣的二月革命的书籍和历史著作，苏联却出版得很少。我们甚至不能不同意一位苏联作者的看法，他在一篇纪念二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虽然发表了大量的材料，但这个题目“在苏联的历史著作中却很不走运”。原来，这位作者认为，对这个题目迄今还“没有一本象样的总结性专题著作”。既未就这个题目写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文章”，也未写过“专题著作”。苏联论述革命历史的作品的质量为何如此不相称呢？一方面是书籍堆积如山；另一方面是没有一部总结性著作，内容重复，互相抄袭。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历史学家必须只按一种模式从事创作，对事态进程只作一种描述，对革命的意义只作一种解释。

然而，独裁和一党制在俄国已经存在了五十三年。尽管如此，过去那里毕竟有一段时期曾出版过有价值的书籍与回忆录，再版过已经传往国外的关于革命历史的书籍。苏联论述革命的著作并不是千篇一律，只要对其主要阶段加以区别和分析，还是可以了解这些著作的。

这里有哪些阶段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确定我们这个题目在时间上的界限，即确定二月革命的开端与结束。在这个问题上并无一致的看法。苏联历史学家往往不是把二月革命真正爆发的日子算作革命历史的开端，而是选择一些政治和社会经济前提作为这段历史的开端，这些前提似乎必然地和“理所当然地”会导致革命的爆发。这种做法当然是颇有道理的，因为既不能忽视革命的“历史根源”和俄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也不可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革命的影响。

关于革命的开端问题也引起了一些非苏联历史学家的争论。例如，哈佛大学前俄国历史教授和侨民三月刊《新杂志》的多年编辑 M·M·卡尔波维奇认为，应当把一九一五年夏季算作革命的开端，那时俄国在军事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国家杜马中的政治反对派活跃起来了。其他的作者认为拉斯普廷被杀是革命的开始，而巴·尼·米留可夫则将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作为革命的开端，这一天，他和国家杜马进步联盟的其他领导人发表了谴责沙皇政府的著名讲话。在本书中，我们把范围限制得更狭窄些。对革命“历史著作的写法”作了这种介绍之后，我们便可直接转入本题，即转入二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所描述的这场革命的主要事件。

革命的结束问题自然也有争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把旧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作为二月革命的结束，在这一天的白天和夜里，布尔什维克党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了革命，而当天夜里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赞同了这次革命。的确，从这一天起，俄国实际上开始了“新的时代”。多党制自由政体让位于一党专政……

别的历史学家则认为，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即苏维埃政权解散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这一天，是二月革命的结束。不用说，这两个日期中的任何一个日期都可以看作是二月革命的结束。不过我认为，唯独最后这个事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应该算是二月革命寿终正寝的日子。在这一天之前，许多人，（甚至为数很多的布尔什维克及其同路人）都对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权”（这在当时意味着是由众多的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政府，而不只是由布尔什维克一家成立的政府），对“俄国大地的主人”——立宪会议的权威存在过幻想。立宪会议的解散使许多希望破灭了，并为布尔什维克首领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 * *

本题的内容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这一点确定之后，我们便可对它加以“清点”，即试图对苏联、西方和侨民的革命历史著作进行分类和介绍。必须指出，由于苏联当局对历史及其作用所持的态度，苏联的革命历史著作比较容易加以分类。在共产党国家中历史的作用究竟如何呢？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曾经把共产党所理解的历史及其作用断定为“非难过去的政治”。波克罗夫斯基是一九三二年，即恐怖主义和叶若夫主义猖獗前几年去世的，他当然既不可能预见到，也不可能亲身感受到，他下的这个十分合乎逻辑的定义，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导致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的毁灭，而且在大多数场合招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

在苏联，全部历史，尤其革命史和党史（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们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

斗争的工具，是某些人物与派别用来进行夺权斗争的有效武器。在共产党国家中，历史的这种作用造成了即便在俄国和西方旧的专制制度下也不可能找到类似状况的局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苏联（特别是从二十年代末起）握有权柄的那个人或那些人，同样能够“创造”历史，并利用他们伪造的历史来取得或者巩固自己的权力。还可以不加夸张地说，在苏联，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或每个领袖集团，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

因此，必须根据最近五十年来这个国家发生的主要政治变化，对苏联论述革命的著作进行分类。虽然每个时期有各种不同的倾向、曲折与阶段，但苏联的全部革命历史著作，尤其是关于二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顺便说一下，这既包括文艺作品，也包括其他各类创作），大体上应分成三个时期：包括二十年代的斯大林以前的时期，长达整个四分之一世纪的斯大林时期，以及斯大林以后的时期。

二十年代——苏联描述俄国革命 的历史著作的“黄金时代”

在苏联描写二月革命的历史著作中，第一个时期，即斯大林以前的时期，无疑是最令人感兴趣、最有创作价值和最符合真实情况的时期。在历史的回顾中，在同以后发生的情况对比之下，完全有理由将这一时期称为俄国革命史上的“黄金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往往把这个时期称作“列宁的”时期。这种说法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在革命后的头十年内，苏联的许多历

史学家还敢于发表同列宁不一致的看法，甚至不承认他那不容争辩的权威。与目前苏联历史学家死乞白赖地企图把列宁说成是“学术界的泰斗”和俄国革命的“第一流天才的”历史学家相反，无论列宁本人，还是他的亲密战友（尤其是本身从事革命历史研究的战友），都既没有认为他是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认为他是大理论家。列宁当年主要被认为是革命的实践家、战略家和策略家，当然也是党的政治领袖。他作为这样一种人写下了许多文章、小册子和书籍。在这些著作中，有时他不得不“附带地”对俄国的历史，对革命运动，尤其是对革命发表一些意见和看法。列宁经常利用历史论据来“创造历史”，但是，他却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

鉴于目前“列宁学”盛行，而苏联历史学家及其克里姆林宫的定货人认为需要并且能够研究伊里奇是如何度过自己“每时每刻”的时间的时候，援引这样一些人的某些言论也许不是多余的；这些人无论在当时或以后，都不会被怀疑有反对列宁主义和企图在某些方面贬低列宁的作用或领袖的意义的行为。不妨举几个例子：当时领导“历史战线”的波克罗夫斯基，在他于一九二三年发表的俄国历史教程中，就只字未提列宁及其对历史学的“贡献”。领导十月革命史和苏共党史资料收集研究委员会的坚定的列宁主义者米·斯·奥里明斯基当年曾写道：“就其天性来说，列宁同志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家”。当时主要的理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一篇论述列宁文集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列宁没有给马克思增添过一句话，但他却教会我们如何懂得马克思”。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大师达·梁赞诺夫不客气地说过多次：“我